

# 西方的汉学研究与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 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再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虽然汉学在西方学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由于其研究方法的独特和理论视角的新颖,汉学研究一直颇受国内学界青睐。本文作者认为,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汉学深受西方学界风行已久的东方主义的影响,存在着对古代中国的种种幻象和对现代中国的误解甚至歪曲,但另一方面又应该承认,西方的汉学界并不乏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家,他们的重要研究成果对国内学界也有着启示。再者,与东方主义所不同的是,汉学中也存在着“去政治性”和“去意识形态性”的倾向,它和国内学者的国学研究应该形成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特别是当我们在把中国文化的成果推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就更离不开与汉学家的通力合作。

**关键词:** 汉学; 东方主义; 全球化; 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095(2012)04-0005-09

在当今的中国语境下研究海外汉学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对西方汉学的研究,体现了国人对欧美的汉学家所取得的成果的密切关注。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学界是很看重外国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喜欢在自己的著述中引证汉学家的著作。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如果真正做到学术无禁区的话,任何人的研究成果只要对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启发,或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起点的话,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人们也许会提出另一个问题:作为专事比较文学和西方文学研究的学者,我们也会在国外,或更为确切地说在西方,受到同等的待遇吗?或者说,西方学者也会在意我们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看法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交流上的这种不平等状态呢?我想,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有笼罩在

东方主义阴影之下的西方学者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有我们中国学者自身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从所谓汉学东方主义的视角对之作一理论反思。

## 一、从东方主义到汉学东方主义

讨论汉学中的东方主义,必然要从对东方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入手。对此我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做过一系列讨论,并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论文,<sup>[1][2]</sup>但是,当时由于国内学界主要关注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以及其代表人物赛义德的代表性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并没有自觉地将其与西方的汉学研究相关联。此外,当时赛义德在西方主流学界风头正健,远未到达为其盖棺定论的境地,因而许多问题一时还无法得出结论。如今,赛义德离世已经快十年了,新一代后殖民理论家已经崛起,他们不断地根据东方

收稿日期:2012-03-27

作者简介:王 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而调整东方主义的内涵。此外,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强大,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东方主义的内涵也自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当今的新形势下对东方主义这个老话题进行重新反思,并结合汉学中的东方主义因素对之进行批判性分析。

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赛义德早期的理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强权政治,其批判的理论基石就是所谓的“东方主义”。他引起广泛影响和争议的专著《东方主义》一般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奠基性著作,不仅影响了整个东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而且也影响了整整一代后殖民理论家的批评实践,同时也影响了我们的汉学研究。今天重温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描述,我们就会认识到,他在建构“东方主义”概念的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东方主义不仅仅只是由文化、学术或机构被动地反映出来的一个政治主题或研究领域;它也并非只是由一些关于东方的文本所组成的结构庞大而又扩散的结合体;也并非只是反映并表现了某些企图制约“东方”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险恶阴谋……确实,我的确切的论点是,东方主义是——但不只表现了现代政治——知识(political-intellectual)文化的某个方面,而且它本身与其说是与东方有关,倒不如说与“我们”的这个世界有关。<sup>[3]12</sup>

显然,赛义德在这里所说的东方主义并不是东方人为自己描绘的样貌或对自己文化的研究,而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不确定的概念,它是西方媒体和一系列再现手段基于对东方和东方人的固有偏见而建构出来的一个虚幻的东西。这个术语翻译成中文,也可以译成“东方学”,所指的是西方学界对东方的研究学科,而且,从赛义德写作这本书的本意来看,也是为

了批判自18世纪以来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在指出这一概念的虚幻性本质的同时,赛义德又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在他看来,“东方主义”至少包括这样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基于对(想象的、诗性的)“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东西方在地理上分别居于地球的东西两半球,在其他诸方面也处于长期的对立状态,其原因不外乎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语言文化上一直存在着的难以弥合的巨大差异。第二层含义则指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的方式,这样一来,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一种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受制约、施与与接受的不平等关系。基于这种关系,所谓“东方主义”自然就成了西方人出于对广大东方或第三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也就是说,所谓“东方主义”本身与地理学意义上的东方(east)并无甚关系,而只是一个被人为地“建构出来的”(constructed)概念。西方学界对东方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一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的,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就具有很大的或然性。

关于东方主义的具体内涵,赛义德认为可以在三个领域里重合:首先是长达四千年之久的欧亚文化关系史;其次便是自19世纪以来不断培养造就东方语言文化专家的东方学学科;最后则是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所描绘并建构形成的“东方”的“他者”形象。<sup>[3]128</sup>由于他们对东方的这种习来已久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本身又不无某种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因此东方便成了西方人以及主流媒体“窥视”的一个对象。说到底,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试图制约和重构东方而制造出来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论体系,始终充当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

应该承认,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和批判确实为我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从事跨学科的文化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论

视野,即将研究的触角直接指向历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并且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东方或第三世界,它在地理环境上与西方世界分别处于地球的两个部分,但这个“东方”并非仅指涉其地理位置,同时它本身还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但是,正如不少东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赛义德所批判和建构的“东方”和“东方主义”本身也不无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具体体现在地理上、文化上和文学上,这也使第三世界的学者和批评家有了可据以进行质疑和重新思考的理论基点。

鉴于《东方主义》一书出版后引来的颇多争议,尤其是来自东方学家阵营内部的争议,赛义德在不同的场合作了一些回应,但其中最有力、并且观点最鲜明的当推发表于《种族和阶级》(*Race and Class*) 1985年秋季号上的论文《东方主义重新思考》(*Orientalism Reconsidered*),这篇论文后收入出版于2000年的专题研究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在这篇论文中,赛义德首先简要地重申了他对东方主义的三重定义:“作为思想和专业的一个分支,东方主义当然包括几个相互交叠的方面:首先,欧亚之间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这是一种有着4000年历史的关系;其次,西方的一个学术研究的学科,始于19世纪初,专门研究各种东方文化和传统;第三,有关被叫做东方的世界一部分的各种意识形态构想、形象和幻想。”但他紧接着又补充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之间的划分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意味着这种划分只是一种虚构。”<sup>[4]199</sup>由于这其中的种种复杂因素,东方主义概念的提出和建构便带有各种主客观的因素,所引来的非议和争议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对此,赛义德并不回避,而是透过各种表面的现象究其本质,对东方主义作进一步的界定和描述:

由于对东方主义的重新思考始终与我早先提及的另外许多这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在此有必要较为详尽地进行阐述。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将东方主义视为一种如同都市社会中的男性主宰或父权制一样的实践:

东方被人们习以为常地描绘为女性化,它的财富是丰润的,它的主要象征是性感女郎,妻妾和霸道的——但又是令人奇怪地有着吸引力的统治者。此外,东方就像家庭主妇一样,忍受着沉默和无限丰富的生产。这种材料中的不少都显然与由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支撑的性别、种族和政治的不对称结构相关联,这一点正如同女权主义者、黑人研究批评家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活动分子所表明的那样。<sup>[4]212</sup>

我们完全可以从赛义德本人对东方主义建构的重新反思发现,经过学界多年来围绕东方主义或东方学展开的争论,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吸纳了批评者的部分意见,并对自己过去的建构作了某些修正。但是由于赛义德的早逝,他没能看到近十年来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大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否则也许会再度修正他关于东方主义的建构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Orientalism 的另一层含义:东方学,并由此进入本文讨论的重点——汉学。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早在18世纪就已经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在当时世界的中心——欧洲。建立东方学的目的旨在从西方人特有的视角来看待东方,运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东方的问题。而更为狭窄一些并更具有民族—国家特色的“汉学”(sinology, 或 sinological studies) 学科的建立则旨在从西方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与我们中国学者所从事的国学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对东方世界(包括古老的中国)的兴趣致使一批又一批欧洲学者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东方诸国,或从事经济贸易或进行文化教育活动,在东方的国土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为东西方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同时,由于西方人由来已久的观察事物的视角和迥异于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致使他们对东方的理解和描绘仍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某些片面的看法或偏见,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便形成了关于东方主义的第二层涵义。正是由此

出发,东方学从一开始就作为西方学术界的“他者”和点缀物的形象而出现。即使是赛义德本人也不例外,他一方面承认东方主义主宰了生产东方文化的人们,致使他们很难超越自己的视野,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这一事实,即并非只有东方人自己才能讨论东方文化,有些问题需要从他者的立场出发才能得到某些洞见,因此讨论东方问题并非东方人的专利。我们完全可以从汉学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中见出端倪。

众所周知,由赛义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美籍中国学者夏志清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先是在海外出版的,然后经过翻译的中介旅行到了中国,对中国学者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些老问题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启示。<sup>[5]</sup>因此我们不可否认,由于汉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客观存在,致使中国语言的普及和中国文化的流传一直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层出不穷更是使得这个领域的学科化和机构化逐步成型。它不但本身自成体系,而且还渗透到一些新兴的边缘学科——如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对这些学科领域内的超越西方中心模式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仅在欧洲汉学界,就出现了像普实克、马悦然、高利克、米列娜、伊维德、佛克马、杜德桥、顾彬、冯铁、施耐德、魏安娜、罗德弼、柯雷、贺麦晓、李夏德这样一批兼通东西方文化并且尤其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国际著名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普及以及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同时,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着扎实的西方文学理论功底和很强的理论阐释能力,因而得出的一些结论为中国国内的研究者参考和借鉴。正如赛义德在为大多数东方研究者在方法论上遇到的困境时所作的辩护所言,“东方学在方法论上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真正的东方与东方学所作的描绘迥然不同,也不能说明,因为东方学研究者大多是西方人,因而不能指望他们把握关于东方的所有内涵。”<sup>[3]322</sup>正是基于我们对西方汉学成果的重视,汉学研究在国内学界才拥有如此高的地

位,这与中国的西方学研究在西方世界的微不足道的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近,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美国学者丹尼尔·乌科维奇(Daniel Vukovich)出版了一本专著,题为《中国和东方主义:西方的知识生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China and Orientalism: Wester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P. R. C.*),这本篇幅不大但却雄心勃勃的专著应该算是将中国与东方主义关联起来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部英文力著。作者在对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有着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汉学东方主义”(Sinological Orientalism)的概念,并以大量的事实对之予以了批判。我们都知道,在国际汉学界,东方主义的存在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有些学者把汉学界的这种东方主义称为“汉学主义”。<sup>[6]</sup>但我比较赞同用“汉学东方主义”,这样可以把汉学研究也纳入整个东方学的大框架下来考察。乌科维奇并非一位汉学家,更谈不上是一位国学家了,而是生活在香港的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美国白人学者。他从外在于汉学和国学的立场提出的批判性建构对我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我们要把汉学与国内学者对自己的文化的研究作一区分。众所周知,在西方学界,汉学出现于18世纪的欧洲,是西方的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它既在总体上与东方学有着相似,同时又在一些具体的方面不同于一般的东方学。其次,我们也应该指出,汉学东方主义也如同东方主义一样,其内涵也随着中国这个被研究对象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过去,当中国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时,它在汉学家眼中的地位也类似东方学者对东方国家及东方人形象的建构和再现。而当中国的经济腾飞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时,对中国的形象的建构又发生了质的变化,甚至在一些西方的主流媒体中出现了“神化”中国的倾向。总之,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就其历史和现行的社会制度而言,始终不同于“我们”,因此始终处于一个“另类”(alien)或“他者”(other)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又是中国呢?让我们首先假设诸如东方主义这种对立和认识论上的挑战,它们三百年来一

直包含了中西方的关系。让我们现在假设它们依然存在,并且在理论上与中国有关……因此,同样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几乎一直是一种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关系。中国的崛起,他作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作为世界性的制造业者,新的亚洲霸主,世界历史的消费市场,美元的不得已的最后买家,第二大经济体,等等。<sup>[7]142</sup>

这就是现在相当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的形象。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再次吸引了西方人的眼球和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一种新的汉学东方主义也就形成了。它与过去那种蓄意贬低中国和中国人的做法迥然不同,但是客观上又把一些局部的现象过度地拔高为整体形象,从而很容易为西方世界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提供理论依据。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在这方面,我赞同顾明栋的看法,汉学研究应该“去政治性”和“去意识形态性”,<sup>[6]</sup>这样就能够返回汉学本来已进行了多年的学术研究。

## 二、汉学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既然汉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必定是基于这种意识形态偏见的产物呢?我看未必尽然。正如顾明栋所指出的,汉学研究本身一直存在着一种“去意识形态性”和“去政治性”的倾向,这尤其体现于对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的研究。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则难免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上面提到的夏志清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产物。尽管那部著作存在着种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历史的局限,但除去其中对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的偏见外,至少对钱钟书、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三位作家的研究和评价还是比较全面和公允的,它的不少论点已经经过了历史的考验,至今仍是站得住脚的,这在客观上对中国学者的“重写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而当这部专著的中译本由港台“旅行”到大陆时(甚至在登陆

之前)对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sup>[8]</sup>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国际汉学界经历了40年的历史考验而长盛不衰,不断地重印。而在国内,这本专著的出版也引领出了“沈从文热”、“张爱玲热”、“钱钟书热”等文化热潮,确实有着深远的影响。当然,像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有着如此深远影响的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并不多见,大部分出自汉学家之手的著作往往在某一方面有着穷尽一点、不及其余的洞见,但是他们特别注重材料的可靠性和原始性,甚至在经费困难的时候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故乡和祖籍,尽可能深入细致地查阅各种原始资料,这一点足资国内的西方文化研究者学习并借鉴。

也许人们会说,夏志清毕竟是出生在中国的美籍华裔汉学家,而且是个地地道道的“母语操持者”(native speaker),而那时的中国大学生一般在入学前就受过严格的汉语,尤其是古汉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训练。加之他早在赴美留学之前,就已经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赴美之后,夏志清在“新批评”的大本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对“新批评派”的那套形式主义的细读法掌握得十分娴熟。因此,基于“冷战”的反共思维和“新批评”的细读方法的结合而产生出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经出版便令人耳目一新。那么对于那些母语不是汉语的汉学家来说,他们又有何擅长和力作呢?我在这部分将讨论德国汉学家施耐德的一部史学力作《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

施耐德(Axel Schneider)作为一位德国汉学家,曾在荷兰和德国的高校任教,并长期担任行政职务,现任蜚声世界的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在汉学研究和教学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莱顿大学任教时,出于对传统的汉学重古典轻现代倾向的不满,提出了建立打通古今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设想,并将这种设想体现于自己的研究中。他的这部专著写于15年前,根据博士论文改写而成。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而且研究的对象

又是中国学界的大家傅斯年和陈寅恪,但是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后,我们丝毫不觉得本书已成为“明日黄花”。书中所讨论的民族文化认同以及中国学术的世界性等问题在今天看来也不乏相当的前沿性和新颖性,并且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近几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一个热点理论课题。

首先,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简单地罗列史料或以史料的发现而取胜的,更在于其问题导向。施耐德在陈述自己著述的出发点时指出,“对中国而言,在与西方发生冲突之后,这种典型的含义在三个方面受到了质疑”:第一,“透过吸收西方的历史科学理论,引发了对史学的认识论基础与其所负的社会政治任务之反思”;第二,“即史学的政治功能问题”;第三,“不论是直接有关史学的内容,或者是间接有关其方法和理论性著述,有一个问题必须探讨,即中国的认同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文化的还是民族的基础之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中国及其文化因而应在世界上占有何种地位?”<sup>[9]10</sup>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施耐德发现,“直到今日,绝大多数有关现代中国史学的西方研究著作都把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上,而以中国20世纪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为题的专著或文章,也只有关于顾颉刚和钱穆的”,<sup>[9]12</sup>而研究傅斯年的著作则屈指可数,研究陈寅恪的就更是难以见到了。这显然与这两位史学大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单就这一点而言,这本专著的写作无疑填补了国际汉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若从当下中国学界的“陈寅恪热”和对傅斯年关注的升温来看,这部写于十多年前的著作至少起到了某种“先声”的作用。

其次,本书在方法论上也不同于传统的汉学研究,按作者自己所言,他“将汉学理解为一种比较文化学。汉学的任务是一方面适当地描述它的研究对象,在跨文化诠释的意义上、在充分考虑到文章陈述的观念史层面和历史环境情况之下,为理解外国文化的表达方式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从客观主义的立场来理解诠释学,汉学家必须考虑到本身的认识兴趣和在世界观上的前提,并将它们以一种解释

的形式呈现出来,因为这些都决定性地影响了其研究课题与应用方法的选择。”<sup>[9]17</sup>由于有了这种跨文化的方法论作为导引,所得出的结论就不仅仅局限于汉学界,而是更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众所周知,傅斯年和陈寅恪都是留学欧美多年并且有着广博学识的大家,尤其是陈寅恪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学术生命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而且在嗣后其价值仍然不断地被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因而未经翻译的中介仍然有着“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并对我们这一代学者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往往由于资料的局限,特别是对他留学欧美期间的研究严重匮乏,这方面的著述也甚少,因而很难使我们今天的学者对这位蜚声中西的国学大师有着全面完整的理解。而施耐德则不仅在中国国内广泛搜集资料,而且还在陈寅恪曾留学的美国和德国的一些大学搜集资料。他发现,陈寅恪早在留学欧美期间,就有着致力于弘扬中国学术的远大抱负,并尝试着用英文发表论文,这对于我们今天实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战略无疑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施耐德不仅到当年陈寅恪留学过的洪堡大学查阅了历史档案,并查阅了陈寅恪发表的英文论文,发现他自己使用的姓名的拼音是“Ch'en Yin-k'o,所发表的两篇英文论文的题目分别为“*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1936)和“*The Shun-tsung shi-lu and the Hsü hsüan-kuai-lu*”(1938)<sup>[9]20</sup>。这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准确性的一丝不苟。由此出发,他还对陈寅恪的治学特色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陈寅恪世界观之特色在于它是出自一种普遍主义类型和对历史特殊性的个别强调之混合。他用这种方式研究史学不用牺牲中国的过去,或者像章炳麟在20世纪头十年的中期那样陷入价值相对主义的苑囿,但又包含了中国与西方的价值相等的意义。陈寅恪主张的一种诠释的方法论正是他的世界观的必然结果……这一套由世界观、史学方法论和历史学家的政治责任组成的完整

概念显然不是陈寅恪出于为了防卫西方要求承认其价值而作的设计,因此更完整。<sup>[9]134</sup>

毫不奇怪,他由历史资料的追踪与哲学分析相结合得出的结论不仅对国内学者对陈寅恪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对试图在国际学界推进中国学术的国内学者也不无启示。

对于傅斯年这位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且有着很大争议的学术大家,过去国内学者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限制对他的研究并不多,而傅斯年在台湾却十分走红。施耐德的著作并没有介入学术政治的纷争,而是把傅斯年当作一个史学大家来研究,并同样在详实的资料追踪之基础上恰如其分地对他的学术贡献给予中肯的评价:

傅斯年的世界观和史观特别突出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反传统,同时又要建立延续性。这让他既可以要求广泛地接受西方,但又不需完全屈居于西方之下和完全放弃与过去的正面关系。这些正面的关系并不像在钱穆和陈寅恪那里那样有着具体内容上的性质,而只局限于正确的科学方法论。这一基本态度反映在方法上的结果就是傅斯年实证主义的、以科学的一致为出发点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考虑事实,把特殊性看作是普遍因素的必然表现。通过诠释将过去的、普遍性建立在一般人性与抽象理念的关系之假设上的意义境界现时化,结果并不是普遍性决定历史,而是在有意识的、受其价值观念制约的人的行动中起着作用,这样的一种史学方法是傅斯年无法赞同的。特殊在傅斯年的史学中只是普遍的一个特别情况,而陈寅恪的诠释法理想则建立在抽象的人文主义共性基础上,并且把历史的特殊性放在研究的中心。<sup>[9]175-176</sup>

这样,站在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之高度来处理史料并加以重新叙述便形成了相当新颖的观点,不仅在汉学界独树一帜,而且对国内

的傅斯年和陈寅恪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虽然这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并非是全新的,但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仍然相当新颖。他同时借鉴了现代阐释学和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从这一视角出发,并没有简单地将纷繁琐碎的历史史料一一铺陈开来,而是选取了那些最与本书论述主题相关的史料加以重新整理叙述,从而一方面还原了这两位史学大家的历史面貌,另一方面又建构出了一个完全可以在全球现代性语境下独显风姿的中国史学大家:两位学术大家的民族认同并非是恪守中国传统的学术,而是认为中国的学术应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与西方乃至国际学界的对话应是平等的,不应该以牺牲中国的传统学术为代价,因为中国的学术应该在世界学术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我们当代学者奋斗的目标。只可惜通晓多种外语的这两位学术大师在国际学界发表的论著实在是太多了,因而很快就淹没在英文著述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里,他们的努力根本没有引起主流学界的重视,倒是被细心的施耐德“发现”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施耐德不仅研究这两位学术大师,而且还深受其影响,致力于在西方学界推进中国的学术。他和美籍华裔学者张隆溪应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约请,编辑了一套系列丛书,将在中国国内有着较大影响的人文学术著作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出版,以完成当年陈寅恪孤军奋战却未能实现的遗愿。可以预见,随着这套书系的不断出版,中国人文学术在国际学界的显示度将越来越高,而在这方面,单凭中国国内学者的努力确实是难以做到中国学术的国际化的。我想这也应该是汉学家的独特优势,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有效地将中国文化学术推向世界。

### 三、走向一种新的中国学建构

如上所述,海外汉学研究领域里确实不乏汉学大家,他们站在中西跨文化的高度,从西方理论的独特视角出发,不拘泥于繁琐的史料,但却能够娴熟自如地运用这些史料产生出全新的观点。这无疑是不少国内的传统文

研究者所难以企及的,因此久而久之,在国内学者中便逐渐产生了一种“唯汉学马首是瞻”的盲目崇拜西方汉学家成果的“汉学心态”<sup>[10]</sup>和“汉学主义”倾向。甚至有人拿自己的作品受到某一位汉学家的称赞作为其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准,因而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所有的汉学家的研究成果都比我们国内的学者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确实,像本文上面所提及的这几位汉学大家即使在西方主流学界也有一定的地位,中国学者对他们尊敬主要是因为他们本身精通中国语言文化,并取得了令国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确实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价值。但是平心而论,这样的学者在国际汉学界实属凤毛麟角,大部分汉学家则有着自己明显的局限:一部分人由于花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掌握了中国语言以及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一个断代史的知识,而在其他方面则知之甚少,甚至在中国讲学时对学生们提出的关于他本国的文学和文化知识都无法回答;一些专攻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甚至连用汉语口头交流都有困难,更不用说用汉语做学术演讲或用汉语发表著述了;还有一些汉学家的理论知识仅停留在新批评或结构主义理论的层面,对当代西方理论的前沿知之甚少,甚至公开反对理论,如此等等。这些都说明,汉学这门学科本身也面临着更新,尤其是欧洲的汉学研究更应该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加强与中国国内学者的交流和对话,并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化、社会和文学现象。而在美国的汉学界,由于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留学生的加盟,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几乎与国内学界同步,甚至在引领学术潮流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们的著述即使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也不失一定的新意。

既然汉学研究在中国受到如此重视,我们或许会想象,中国的西方文学研究是否也在国外受到同样的重视呢?答案是绝对否定的。其中的原因应该从两方面来找。首先,西方学界对西方世界以外的学者讨论他们的文化并不十分在意,他们偶尔邀请一些中国的西方学研究者前往演讲,也常常像命题作文式地要他

们(我自己就经常享受这样的“待遇”)介绍某一位西方作家和某一种理论思潮在中国的接受,一些学术期刊有时也会发表中国学者撰写的此类文章,而对于中国学者就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专题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就不太在意了,更不用说去花时间把中国学者用中文写作的著述翻译成外文出版了。这也就不难回答这一问题了:西方的一些二、三流汉学家的著述都能被国内学者译成中文在中国的主要出版社出版,而中国的一流学者要想在国际(主要是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却很难,更不用说出版著作了,除非他们讨论的是受到西方学界关注的中国当代问题。其次,我们也应该从我们自身学术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我们的研究是否在资料的可靠性、方法的新颖性和理论的前沿性方面均达到了国际一流?我们的西方文化研究者也会像一些汉学家那样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故乡去仔细搜寻查阅一些原始资料吗?或者仅仅满足于本国甚至本校图书馆里的一些有限的几本原版书或网上现成的资料?当然,对于国学研究,国内学者要做到资料的可靠并不难,但在方法和理论上的突破就很难了。因此当全球化的时代来临,汉学家可以很容易地飞来中国,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研究资料时,就不屑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上向中国同行请教了。我想,我们的西方文化研究者如果具备这些汉学家的不辞辛苦和深入钻研精神,我们也可以就西方学术前沿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发表我们基于中国视角的看法,这样我们也完全有可能引起西方主流学界的关注,进而与他们进行平等对话,甚至影响并最终使他们改变自己基于西方视角得出的不完备的结论。我认为这应该是西方的汉学对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如上所述,随着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随着西方的东方主义内涵的改变,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尤其是首先应当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有自己的话语权。西方的汉学家也应该认识到,一个新的国际中国学的建立应该有中国本国学者的参与,他们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这样,中国学研究才能真正作为一门学科

而“去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回到学科本来的研究上来。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主动介入和积极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 参考文献：

- [1] 王宁. 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J]. 北京大学学报, 1995(02): 54-62.
- [2] Wang Ning. Orientalism versus Occidentalism? [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7, 28(1): 57-67.
- [3] Edward Said. *Orientalism*[M]. New York: Doubleday Books, 1979.
- [4] Edward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 - 1957*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revised edition.
- [6] 顾明栋. 什么是汉学主义?——探索中国知识生产的新范式[J]. 南京大学学报, 2011(03): 112-123.
- [7] Daniel F Vukovich. *China and Orientalism: Wester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P. R. C.*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8]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刘绍铭, 等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9] 施耐德. 真理与历史: 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M]. 关山,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10] 温儒敏. 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J]. 文艺争鸣, 2007(07): 51-55.

## Western Sinology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Humanities Studies

WANG Ning

(Institute of Arts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study of overseas sinology has once again become a cutting edge theoretic topic. Although sinology has long been marginalized in Western academia, sinological studies has always been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n domestic scholarship, due to its unique research approach and fresh theoretic perspective. To the author,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realize the long-standing influence of Orientalism on Western sinological studies, as a result of which ancient China has been fantasized and modern China has been misunderstood or even distorted;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quite a few outstanding sinologists in the West, whose important works have certainly enlightened us domestic scholars. In this sense, we should say that unlike Orientalism, sinology implies a certain “depoliticizing” and “de-ideologizing” tendency. It should carry on equal dialogue with domestic Chinese studies and complement the latter. Especially when we want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ese culture world wide, we all the more need to cooperate with Sinologists.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results achieved by the sinologists have also given China's Occidental studies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Sinology; Orientalism; globalization; Western culture; Chinese culture